



有时，我们竟觉得

自己有幸参与编制的这本《散文》

像歌德

不衰的生命力，不排斥任何风格的艺术胸怀，不停地开辟着

让思想得以漫步的疆域

尤其重要的是，和歌德一样，《散文》

尊重洋溢在世俗生活中的智慧、欲望、趣味和情感

散文2003年精选集

散文杂志社 ● 选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1988→1989→1990→1991→1992→1993

2000→2001→2002→

ESSA

散文
2003
精选集

散文杂志社 ■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散文 2003 年精选集 / 《散文》编辑部编选. 一天
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3

ISBN 7-5306-3809-2

I. 散... II. 散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7403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※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5.75 插页 2 字数 309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8000 册 定价: 37.00 元

写在前面

见到这本书的时候,您同时在市场上也一定见到了《散文》新的一年的第一期。那是我们刊物的第二百八十九期。在上个世纪大把大把的时光里,文学处于荒废或亚健康状态,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的刊物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厚传统和定力。

二十多年以来,我们没有给散文下过一个定义。但是,在今天,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,几十位先后在《散文》工作过的人,他们怀有一种共同的沉重的责任:让散文成为它自己。

我们远离了我们应该远离的,我们亲近了我们应该亲近的。于是,《散文》始终是《散文》。

所有照亮黑暗启迪心智的思考,都值得我们收藏;所有为丰富汉语写作形式上的可能性的努力,都值得我们珍视。

所有怀有一颗平常心的人,都是《散文》的朋友。

汪惠仁

二〇〇四年一月

那古老 幸福 忧伤的

王 陆	1978之恋 003
余光中	另一段城南旧事 008
高建群	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 013
李汉荣	父亲和他用过的农具 024
周晓枫	幼儿园 035
雷平阳	云南黄昏的秩序 053
朱以撒	等待清洁 059
高 勇	沉默的品质 066
阿拉旦·淖尔	母性的草原 069
人 邻	那古老,幸福,忧伤的 072
鲍尔吉·原野	胡四台老家 083
李江树	少雨的土地 095
刘鸿伏	不可深入的大地奥区 102

生长的和埋藏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113 | 心灵史·童年 | 胡 弦 |
| 120 | 入世者手记 | 江 子 |
| 128 | 生长的和埋藏的 | 冯秋子 |
| 130 | 死亡四种 | 朝 阳 |
| 137 | 盲人日记 | 叶全新 |
| 144 | 在西海固的一个村子里 | 季栋梁 |
| 158 | 豫东人物碎片 | 皇甫风平 |
| 167 | 岁月深处,大地上的房子开过花 | 冯文柯 |
| 169 | 叶子时期的梅 | 晨 义 |
| 171 | 所有的天空都是你的 | 江 飞 |
| 173 | 穿多少条巷子才能到家 | 沈 念 |
| 178 | 被剪辑的草原 | 洪 烛 |
| 182 | 夜晚的路 | 范晓波 |
| 185 | 墓地 | 沙 爽 |
| 191 | 举着易碎的瓶子 | 陈蔚文 |
| 196 | 缓慢的马车 | 周蓬桦 |
| 201 | 雪天,在城市 | 郑亚洪 |
| 205 | 午时的树下 | 林 闻 |
| 208 | 街角,令人伤感的风景 | 孙建平 |
| 215 | 柔软的 | 盛 慧 |
| 220 | 母亲与刮入院子的西北风 | 齐明达 |

熊 亮	理想的不自由 227
韩松落	金缕鞋 233
卞毓方	想像 238
半 夏	看雪的线索 243
朱 苓	无题 246
朵 渔	拜访大师 253
沈天鸿	纤夫 260
苍 耳	水落石不出 262
朱千华	檀板旧梦忆江南 265
凌 鹰	跟霍贝玛回家 268
梦亦非	深紫罗兰浸染的田野 272
吴梦川	民乐过耳 276
冯 杰	散帖 279
赵 川	去Tahoe湖 282
熊培云	街道上的巴黎 288
徐 鲁	荒野仙踪 292
阎 红	底层男人的爱情 298
三 焦	朴树、诗歌列表和USB咖啡 300
廖无益	离尘世一尺远 304
陈 益	拉雪兹墓地的栗子 307

313	老茶馆	车前子
322	怀旧的苏州	荆 歌
333	可盛的心	马明博
337	谁最后记得我的那个人	谢宗玉
344	薤露	谢慧黎
350	聊天	小 茶
355	斗人玩	陈 驰
359	三轮车夫	张立勤
363	尧都土话	乔忠延
367	吴中风物	魏向东
372	也写一回吃	方英文
375	北京,以及燕京啤酒	龚德海
378	水果罐头	曾 园
382	独奏	瓦瑶河
386	回家	独 化
390	江南旧影	曾一果
396	举炊烹饮日月间	王 芸
400	爱情不能解析	唐泽慧
403	丢失	纳兰小令

可盛的心

那古老 幸福 忧伤的

第壹辑

1978之恋

王 陆

1978年,我18岁,考到辽宁师范学院(现为辽宁师范大学)。入学那天,下小雪,我戴着小瓜皮解放帽,想找中文系的楼。我看到有一个包着破头巾的妇女在我前面走,我就先喊她一声阿姨,问她知不知道中文系的楼怎么走。她说她也在找中文系,她也是新生。我们俩就一块儿签字报到,一块儿走进教室。我们俩同班,我们俩差十四岁。后来我一直叫她孟大姐。她是班里最大的,是一个母亲,我是班里最小的,是一个中学生。在我们俩中间的同学是各种年龄各种职业,下乡知青最多,工人其次,还有卖水果的、修理自行车的和军人。我们的第一堂课是英语,一个刚从俄语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教了我们八个字母,从A到H。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字母旁边标上汉字,跟老师很努力地读。课间休息的时候,很多男同学都聚在一起卷旱烟抽,走廊和教室里是乌烟瘴气,满耳粗话和尖锐的话。在宿舍也是一样。那时我很愿意挤在他们堆里,听他们讲。在他们中间,我什么都不如他们。记得教我们鲁迅课的张老师开玩笑说:这里哪像大学?这里就像工农革命讲习所。那时我们都渴望了解文明的东西,伟大的文学是一个,自由的思想是另一个。我非常幸运,我什么都不懂,但我能和这些比我年长的比我有思想的青年们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1978年,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坐在大学课堂里。

1978年的校园很破,教室也很破,图书馆更破。图书馆的书库是刚刚揭开封条的,每一本书都落满尘埃。但仍有一些书还没有完全解放,要借阅是有限制的,是供批判用的,比如沈从文的书、肖洛霍夫的书,等等。记得有一位俄苏文学老师,他姓杨,他讲高尔基讲得不多,讲得很有敬意;但他讲肖洛霍夫讲得很多,先是绘声绘色地讲,然后是大声批判,说肖洛霍夫拍过赫鲁晓夫的马屁,也是一个修正主义者。但他第二天又积极组织我们看根据肖洛霍夫作品改编的苏联电影,有邦达丘克主演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,有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和《静静的顿河》。这些在当时还是禁

Essay · 2003

精
选
集

003

1978之恋



片，他把它们作为批判资料让我们看了。我们整整看了三天，把其他作家的课都占用了。看完了，我们都很热烈，他却什么也不说。考试的时候，他只考高尔基，不考肖洛霍夫。我们在上大四时，这个杨老师就得癌症病逝了。现在回想，杨老师那时是中年，对“文革”后的现实仍然是小心的，知道怎么曲折地表达认识。现在我也到了中年，才理解老师，他有文学的良心和世俗的苦心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像他那样，其实在1978年和1979年的大学文科讲坛上，说假话，搞形而上，搞一家之言，仍然是主要风气。这种风气是“文革”的灵魂的延续，我们对此都深恶痛绝。记得那时有一位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老师，他是刚从“五七干校”解放出来的，是受了很多的苦的，按理说他对这个专业应该是有思考的，但他讲课完全是“文革”师爷的路子，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问题时，就像讲梦话一样。我们开始还给他提醒一些现实的情况，想与他有一些科学争论，但这个老师很不习惯这样，他用了一堂课的时间训斥我们的信仰有问题。后来我们根本不搭理他，甚至当着他的面走出教室，他的课就没有几个人听了。那时，我们不在乎考试成绩，我们很在乎科学的东西和自由的东西，我们很怀疑讲义，也怀疑那些在政治上四处讨巧的作家和作品。那是一个思想破土而出的时代。我们都拥到了图书馆。1978年的辽师图书馆是一个自由的地方，开禁的书籍和杂志是我们的中心，我们再没有别的其他欲望。那时的图书馆是多么小啊！我们往往一早就跑到图书馆门口排队，等着开门能占一个座位。大学四年，我们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在教室的时间要长。自由的阅读燃烧了我们。当时背过的讲义和所作的笔记现在都是一堆废纸了。而当时读过的好的作品，现在还在心里。虽然1982年我们毕业的时候，还有一些思想和文学禁区没有打破，还有一些书仍然贴着封条，像爱伦堡、索尔仁尼琴、胡风等，他们的书依然不能见天日，但是，“左”的东西毕竟不像以往那样专横了。我工作以后就陆续读到了他

们。现在和以后的大学生可能不能想象那样的事情,但1978年就是那样。

1978年是一个阵地界限,有人负隅顽抗,有人吹起号角。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》是政治号角。实话说,我们当时年轻,对这篇文章的认识还非常浅,真正的认识还是在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回头反复读才领悟到了一二。但是,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小说《伤痕》就不一样了,它一发表,就在我们中间爆炸了。这是当时最激越的一声文学号角。那时,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。从文学到政治,从写诗到办杂志,那时我们真是不怕天高地厚。记得当时我们的教室仍然挂着华国锋的领袖像,下面还有一个标语“你办事,我放心”,但有一天上课的时候,我们班的陈洪迪上去把这个像给扯下来了,把标语也给撕了。这在当时是一个突发事件。我们很兴奋,我们的思想都在刚刚解放的火头上,但那个上课的女老师给吓跑了,她把院系领导和保卫科的人都给找来了。就在陈洪迪等待处理的时候,中央发生了大的变化,邓小平出来了。我们系一位领导事后说,陈洪迪是顺应了政治潮流,要不然,他这个反革命是没跑的。这句话很有政治经验。但这句话不对!不是陈洪迪顺应了政治潮流,而是政治潮流顺应了人心,这才是1978年。大学毕业后,我再也没有见到陈洪迪。陈洪迪年长我很多岁,现在也快有五十了吧?他现在做什么呢?我在心里一直很念及他,因为我那时有很多新东西都是先从他那儿知道的,如索尔仁尼琴的《伊万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和叶文福的长诗。我记得有一天中午他在班里朗诵叶文福的诗。他的声音并不好,但他有激情,我们一边吃午饭,一边静静地听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,情与景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谁还知道叶文福的诗呢?这位写下新时期第一个反腐败作品的勇敢诗人好像是彻底地消失了。书店有这么多的诗选或诗集,我都没见到叶文福的名字。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而为,还是风气使然。1978年,作家和艺术家是做得最多的,是他们首先说了真话,是



他们表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能够战胜虚假和愚昧！他们在前面顶着风雨，后面是政治、经济和各行各业在悄悄跟进。

1978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大连是下着大雪的。那天我们中文系搞了一个晚会。其实，那算不上晚会，那只是一个会餐。在大食堂里，很冷，我们同学都在猛吃炸肉丸子和炸刀鱼，还喝一点啤酒。77级有一个男生拉着一个女生的手走到大厅中间摆上跳舞的姿势，这让我们的心一下子动了起来，我们把他俩团团围住。他俩不会跳舞，但他俩非常想跳。那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场舞会，有《送你一朵玫瑰花》的音乐，有美丽的感情，有先锋的意气。现在，天天弦歌袖舞，宝马香车，那时的一切都不算什么了。这就是发展。这对我们是一个逼迫。我们本来是有1978年的根基的，但这个根基很薄，我们只是一片苇草，无法成长为树林，所以，我们慢慢出现了问题：精神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干燥；手越来越长，越来越湿黏；能做的不肯做，不能做的偏要挣扎着去做。有一个女同学，在学校的时候曾经演过《娜拉》，很有风头。最近听说，她在国内办完了离婚手续，去日本嫁给了一个很老的日本老头，还在那边生下一个孩子。她比我大好几岁，现在应该是四十四五岁的人了，这样的大龄还要努力为绿卡而生育应该是很不容易的。我想，不管她是什么原因做出这个选择的，她的心一定是很艰难的。还有一个在机关工作的男同学，他原来是很有修养的，热爱莎士比亚，能用原文背诵《奥赛罗》的大段台词。最近听说他出事了。他有一个青春健康网站，他利用那里做掩护卖黄碟，拉皮条，卖白粉，结果让公安局给抄了，给了重判。某次酒醒之后，我想：1978年的显性思想统统都蜕变成暗物质了吗？1978年的自由飞翔，现在都要服从这样的栖息方式吗？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悲观：我们不可救药！

坏消息不断地有，最近，杨大健同学病逝了。他也是年长我好几岁，是我们班在专业上很努力的同学。想到他中年病死，我有一种飘零的感

觉,这种感觉又延伸出一个疑问: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回旋余地吗?这个疑问让我非常难过,我甚至不能控制自己。今年春天我离开大连,一个人去俄罗斯旅行。其实,去了俄罗斯又怎么样?从贝加尔湖到圣彼得堡,一路都是庸俗的眼神。我想找到某种情绪资源或者是某种思想遗址,但我找不到。我只好一路思考,想到精神生态问题。二十多年来,我为什么没有长成一棵树?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一片森林?这种思考没有答案。我在圣彼得堡时,听说谢斯特罗列茨克镇有大作家左琴科的墓地。我找到那儿,看到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墓碑。我记起了左琴科的话:“我们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堕落负有责任。”

我问墓碑:我的责任在哪儿?

墓碑答我:你贩卖了你的器官。你参与了对公共精神的猥亵。你讨价还价。你纵欲。你萎靡不振。你勾搭权力和金钱。你形而下。你对人类的痛苦幸灾乐祸。你为罪恶的勾当添枝加叶。

我抚摸墓碑,左琴科一动不动,我却在摇荡。我终于往回走,我回到主题:1978年是光荣的,却难以恢复。如果1978年成为遗迹,那样也好,总会有一些残简断章传下去。但是,如果1978年成为遗迹后又被夷为平地,甚至在这平地上面盖上了私人别墅呢?其实我这个想法很偏离主题了,说出去,会惹人嘲笑,不合时宜。

另一段城南旧事

余光中

林海音的小说名著《城南旧事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，所谓城南，是指北京的南城。那故事温馨而亲切，令人生怀古的清愁，广受读者喜爱。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，另有一段“城南旧事”，林海音自己未写，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。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，却在台北。

初识海音，不记得究竟何时了。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六〇年代之初。我在“联副”经常发表诗文，应该始于一九六一，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。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，渐渐成为朋友，进而两家来往，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。

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。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，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，都在城南，甚至同属古亭区。从我家步行去她家，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，沿街穿巷，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。

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，我还在“联副”刊登了长篇的译文，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《书袋》和“生活”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《缪思在意大利》，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。

记得夏天的晚上，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。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，都会欣然跟去，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，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，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“捞金鱼”。

海音长我十岁，这差距不上不下。她虽然出道很早，在文坛上比我先进，但是爽朗率真，显得年轻，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。但径称海音，仍觉失礼。另一方面，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呢呼“海音姐”或“林大姐”，又觉得有点俗气。同样地，我也不喜欢叫什么“夏菁兄”或“望尧兄”。叫“海音女士”吧，又太做作了。最后我决定称她“夏太太”，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“夏先生”，似乎以此类推，倒也顺理成章。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，不够交情。

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,所以祖美、祖丽、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,倒真像一群大姐姐。她们玩得很高兴,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,也因为我家的四珊,不瞒你说,实在很乖。祖焯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,又是男生,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。

不过在夏家做客,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,什么呢,不是陌生,而是奇异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,他们不但说京片子,更办“国语日报”,而且在“国语推行委员会”工作。他们家高朋满座,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。在这些人面前,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,ㄗㄝ不卷,ㄅㄨ不分,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。用语当然也不道地,海音就常笑我把“什么玩意儿”说成了“什么玩意”。有一次我不服气,说你们北方人“花儿鸟儿鱼儿虫儿”,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“肉麻儿”。众人大笑。

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。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,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,至少就包括潘垒、黄用、王文兴与“蓝星”的众多诗人。巷腰曾经有《新生报》的宿舍,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。巷底通到同安街,所以《文学杂志》的刘守宜、吴鲁芹、夏济安也履印交叠。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,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,来按电铃。

就像旧小说常说的,“光阴荏苒”,这另一段“城南旧事”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,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。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。从一九七四年起,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。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湾,却来了高雄,常住在岛南,不再是城南了。厦门街早已无家可归。

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,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,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,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。每次从香港回台,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。众多文友久别重聚,气氛总是热烈的,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,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,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。女主人天